

## 王渔洋的佛门交游及其禅宗思想

### ——关于厘清渔洋“诗”与“禅”关系之公案的必要阐释

李圣华

**提 要：**清初佛门大盛，王渔洋与蒋超、梁熙等人为代表的居士禅与之相表里。渔洋参禅礼佛，交游剖石、继起、见月、拙庵、大汕诸佛门龙象，昌言以禅补儒，禅悦性灵，批评明末以来辟佛风气；提倡佛门无诤，欲平息济洞聚讼，还佛门清净地；重戒律修行，不满僧人修行不密，风气日颓；以禅喻诗，释语入诗，重活句以得禅髓，开拓诗境。渔洋不以学问见长，然通达禅理要不可诬，其事足增踵佛门，“神韵”说也深受禅宗影响。通过考察渔洋佛门交游与禅宗思想，大抵可厘清学界争讼已久的渔洋是否通禅理、“神韵”说是否与禅宗关联密切一段公案。

李圣华，文学博士，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。

关键词：王渔洋 佛门交游 禅宗思想 “神韵”说

晚明三教合一流行，士大夫喜参禅礼佛，李贽还开辟狂禅一派。万历中叶，攻禅渐兴，东林之学继起，禅悦风气受到很大冲击。明清易代带来社会思潮巨变，清初佛门大盛，遗民逃禅与佛门斗诤之炽皆前所罕见，居士禅与之相表里，引人注目。一代诗盟王士禛，号渔洋山人，标举“神韵”说，开启神韵诗派。他喜禅悦，与蒋超、刘体仁、梁熙、高珩、王泽弘等身居庙堂而通达禅理。清人彭绍升《居士传》采摭不广，多失录之。在神韵派研究史上，“神韵”说与禅宗关系的争讼为学界一大公案，或称渔洋深受禅宗影响，或称未通禅理，以禅喻诗不过取其机便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要厘清这桩公案，有必要考察渔洋与禅宗的关系。本文探讨渔洋佛门交游及禅宗思想，冀为理清二者关系、深入探讨神韵派提供一些依据，同时揭示清初佛门斗诤及居士禅的一些发展情况。

#### 一、习禅经历

新城王氏为山左望族，渔洋诗歌家学渊源有自，习禅亦然。祖象晋、叔祖象春、兄士禄俱通佛理<sup>①</sup>。渔洋早慕禅悦，《居易录》卷32称冯梦禛《快雪堂集》颇得禅悦山水之趣，“予少时极喜之”<sup>②</sup>。顺治十五年（1658）成进士，观政兵

部，寓慈仁寺，遇鄱陵梁熙，叩所学，知尤深禅理，遂定交<sup>③</sup>。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任扬州推官，公事之暇寻求吏隐之乐，结交半山、硕揆诸衲。不过他对禅学尚理解未深，康熙四年（1665）《游宝华山记》已透露一些消息：

三昧律师绍鹅头宗，继来卓锡。见月大师亲承付嘱。予比闻其具戒精严，为人天师，至是始相见山中，一灯夜坐，往复叩击，乃知浮屠之说，与吾儒道德仁义之旨，了然不殊。<sup>④</sup>

所谓与见月往复叩击始知儒释相合之理，当非自谦。前此数日栖霞山礼洞宗觉浪大师塔，也深有未能从之问法的遗憾：“药地、嘯峰诸老，一时名德耆宿，皆为座下龙象，如灵山一会，俨然未散。自恨生晚，不获厕桓因之末，犹幸亲近和尚，略沾法乳。”<sup>⑤</sup>渔洋内迁礼部主事入都，偕梁熙、刘体仁、王泽弘、高珩、蒋超诗歌唱和，参禅礼佛。《三月晦日，公勔招同曰緝、玉虬、荅文、周量、玉随、湘北、子端集河楼，得绝句五首》其五“三年禅榻过春风”形容一时景况，大抵可信。康熙十四年（1675）《五君咏·梁侍御曰緝》：“作佛固未能，萧然自禅悦。”亦是自况。他晚年尤耽禅悦，与拙庵、楚云、灵轡诸僧叩击禅理，以羁迟仕宦为憾。仿白居易故事以《渔洋集》刻本置佛寺，“愿以今生世俗文字之

因,转为将来世世赞佛、乘转法轮之缘”<sup>⑥</sup>。熟读《林间录》,征引禅语论学证诗,所作不喜堆砌典事,却好累用佛典,甚至自称“老耽禅寂,遇事短吟,略如竺氏颂偈,不应更作文字观也”<sup>⑦</sup>。

关于渔洋参禅动因,除家学承传、个人好尚、晚年心境变化外,还有特殊的历史原因:

一是士林逃禅风尚。易代后,遗民纷然以佛门为生命避难所与心灵栖居地。尽管逃禅或不得已,如归庄所说:“岂真乐从异教哉?不得已也!”<sup>⑧</sup>但还是推毂了佛门大盛。渔洋受逃禅风气影响,对“有脱而逃”的觉浪、药地、竺庵、石溪、半山、尺木禅师极其推重。

二是清初帝力沾化。佛门本是帝力外的存在,顺治帝尊推禅宗,将佛门也阑入政治关照之内。僧通琇字玉林,嗣法磬山天隐,住吴兴报恩寺,三次应召说法,赐号大觉禅师。道忞字木陈,嗣法密云圆悟,与玉林俱临济传人,召入京师,赐号弘觉禅师。木陈《越州云门寺兴修疏引》:“爱自己亥仲冬以来,征车四出,博访禅门耆宿,而余亦忝辱天书下逮,驰驿上京。蒙上恩遇,待以不臣,每当叩击玄关,未尝不虚己洁诚,劳谦选问。”<sup>⑨</sup>木陈入都,渔洋适在京谒选,《居易录》卷24“顺治末应诏入京,赐号弘觉国师”,殆亲历见闻。其时受帝王垂青的高僧尚多,碧禅师等皆是。明末朝廷禁止士大夫参禅礼佛,清初情势不同,顺治帝的态度决定着士人言论取向,上行下效,从渔洋饶具兴致的“盛事”载记就可觐知其参禅与帝力沾化之关系。当时士大夫倾向接受禅宗,刘体仁、梁熙、蒋超、高珩等精通禅理,受到士林誉赏。这也构成渔洋习禅的具体时代环境。

## 二、佛门交游

明清之际,沆仰、云门、法眼并微,曹洞、临济复振。渔洋佛门交游多洞、济宗人。遗民僧虽众,但仅交往在柯、屈大均等数人,且与大均定交时,其已弃释归儒。至如所推重觉浪、石溪、药地、尺木,俱不及从游。以下按时间先后,分期略述渔洋佛门交游情况。

第一时期:顺治十七年(1660)至康熙三年(1664),即扬州推官五年任上。渔洋此前喜禅悦,但偶或与僧人过从,如顺治十六年晤灵簪,未及商讨禅理。初至扬州,与在柯结诗禅之友。在柯字半山,入清后怀思故国,浪迹山水,工诗

善画。渔洋为作题画诗多首,如《半山爱予寒江落潮之句,为作图,愚山题诗其上,和答一首》:“何当结屋图中居,卧看江天落潮白。”<sup>⑩</sup>顺治十八年交游颇值得注意。春日赴苏州,寓圣恩寺,晤汉月高弟子弘璧,赋诗赠之<sup>⑪</sup>。弘璧字剖石,与继起、具德等为汉月嫡传,精于佛藏,修行甚密。著有《圣恩语录》。访继起未遇,继起未几惠寄《虎丘志》,渔洋《答继起和尚寄虎丘志》:“方外劳君寄消息,青溪东望旅情深。”<sup>⑫</sup>七月在仪征结交具德嗣法大弟子巨渤,谈禅论诗。巨渤名恒,时主真州天宁寺。渔洋《天宁寺访巨渤和尚,示景州、歙州》:“谈禅松子落,留客竹园开。”<sup>⑬</sup>这一时期交往的诗僧还有铁帆,《池北偶谈》卷18:“顺治末,予官扬州,铁帆住木兰寺。刘吏部公勛闻之,寄予书云:是‘天寒衣衲重’铁帆耶?‘天寒衣衲重’,乃粤僧一灵句,公勛误记耳。”

应该说,渔洋与诸名僧交游的兴趣并不在深究佛理。与在柯、铁帆唱和即可见一端。吴门访弘璧,匆匆一晤,访继起又不遇。弘璧、继起为一时佛门龙象,精通儒释之理,继起还著有《孝经笺说》。然渔洋无缘聆其详为说法,否则也不至于康熙四年晤见月始悟儒释相合之旨了。

第二时期:康熙四年(1665)至十一年(1672)。康熙四年,渔洋将入都,以南京胜迹多未登览,偕遗民方文登牛首,至献花岩,次祖堂,后往摄山、宝华山。五月十九日,祖堂访遗民僧髡残不遇。二十一日摄山礼觉浪和尚塔,晤其嗣孙楚云。楚云名兴源,曹洞三十一世正传。二十二日冒雨往宝华山,访见月,夜宿谈禅。见月名读体,师从三昧,整饬戒律,四方缁素翕然从风。著有《大乘玄义》、《三坛正范》、《毗尼止持》。二十三日返扬州,楚云来送别,渔洋《龙潭登舟,栖霞僧相送》:“终卜僧绍邻,长兹味禅悦。”<sup>⑭</sup>后与见月未再晤,楚云则两入都过访。《居易录》卷33:“康熙癸酉,曾访予于京师。庚辰,自建昌之寿昌,返栖霞,复来京师过访,云将归老南岳,且云:‘居士大名,今日欧、苏也。’”渔洋曾向楚云索观寿昌、博山、阆然、觉浪语录文集,《渔洋集》刻成,付一本与楚云藏南岳。这次南京之行对渔洋习禅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:一方面,聆听见月说法,悟儒释相合之理;另一方面,开始关注当时日益激化的僧诤。

渔洋北上前,还曾偕兄士禄与僧愿志唱和。《居易录》卷24:“上人及予兄弟赋诗纪事,诸名士和之,有《禅智倡和诗》一卷。”愿志字硕

揆，本名孙弘，尝为史可法中军，清兵下扬州，隐遁灵隐寺，受戒为具德弟子。康熙四年自灵隐住扬州禅智寺。后往常熟三峰，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）致书征诗，渔洋赋六绝句，诗至而愿志已示寂。

自康熙四年北上至十一年闻母丧归里七年间，渔洋偕汪琬、刘体仁、梁熙举诗酒之会，谈禅礼佛，交往僧人并不多。但既已悟儒释合一之旨，参禅礼佛又是宦辙余迹，故流连诗禅之间，怡然自得。

第三时期：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庐居至五十年（1711）卒世。渔洋丁母忧间，复遭兄士禄之亡，哀痛中诗亦不多作，诵读经卷，与灵璧往来密切。灵璧名元中，师事木陈弟子天岸。康熙十三年（1674）继主法庆寺，不喜佛门斗诤，律守精严。康熙三十年（1691）示寂，渔洋《法庆灵璧禅师塔铭》：“马祖嫡子，厥惟百丈。黄檗宗旨，溥施大畅。迄于天童，正令提唱。何以接人，德山痛棒。诸大弟子，巍巍龙象。三世泊师，当仁不让。”<sup>⑨</sup>康熙十五年（1676）补户部郎中，九月妻张氏卒于家，赋《悼亡诗》，有“药垆经卷送生涯，禅榻春风两鬓华”之句<sup>⑩</sup>。

其时渔洋诗名盛传海内，衲子来唱和定交者不绝。康熙十六年，拙庵寄《电光》、《云鹤》集乞序。拙庵名智朴，洞宗百愚弟子，住盘山，能诗，渔洋为删定诗集。《居易录》卷2：“拙庵丁巳以诗抵予，以所著《电光》、《云鹤》诸集属序。予亦两有诗怀之。庚午二月五日，侍者自山中来，寄诗云：‘宫詹学士老诗伯，笔扫时风绝世才。日把盘山怀我句，横肩柳栗几时来？’”拙庵撰《盘山志》，渔洋襄助之，并撰《盘山志序》：“古称赞宁释氏董狐，觉范僧中迁、固，若大师者，非其人欤！”<sup>⑪</sup>《渔洋集》刻成，以一本付拙庵藏盘山。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，超晓过访。超晓字尚德，性海四世法嗣，济宗三十三世，住尧峰露禅庵。明年归吴中，渔洋作《送吴僧尚德归尧峰》<sup>⑫</sup>。同年，普熙过访。普熙字秋皋，本师苍雪住苏州楞伽中峰寺，有《南来堂稿》。《渔洋诗话》卷上：“近日释子诗，以滇南读彻苍雪为第一。”<sup>⑬</sup>秋皋亦能诗，《池北偶谈》卷13：“秋皋有句云：‘鸟啼残雪树，人语夕阳山。’亦有家法。”《送吴僧秋皋之津门》：“爱君残雪句，宛似碧云篇。独向中峰住，深参五味禅。”<sup>⑭</sup>康熙二十三年、二十四年，渔洋奉使南海，庐山曾晤宗雷、杲庵、颺庵，皆有诗赠之。至广州长寿庵，访觉浪弟子石濂。然《分甘余话》极诋之，下文

详有辨析。

这一时期，渔洋不仅追求诗禅合一，而且喜深究禅理，尤好读《林间录》。他虽不喜僧诤，但还是一定程度上卷入佛门论争。

总体来说，渔洋佛门交游有以下几大特点：一是交游广泛，既有济宗传人，又有洞宗传人，弘璧、继起、见月、拙庵、石濂等俱一时佛门龙象；二是交游有一个显著的变化过程，即从诗禅交游到商讨禅理，再到卷入僧诤。三是诗禅交游是贯终始一的兴趣点。渔洋结识僧众远不止于以上谈到的这些，他如木陈高弟子元璟、灵璧门人荆庵等皆是，此不具论。而且渔洋佛门交游也远不止于慕禅悦高风，追求名士风流那样简单。佛门交游对其人生方式、学术思想、诗歌理论及创作，都产生深刻的影响。

### 三、禅宗思想

渔洋中岁后萧然禅心，多阅佛典。他不以学问见长，而喜论学，谈禅文字不无浅薄处，但通达禅理要不可诬。以下从三方面简析其禅宗思想。

（一）以禅补儒。渔洋以为禅宗有补儒之功，故多征引以证儒理。如《居易录》卷20：“龙门世奇首座，洞臻玄奥。佛眼禅师命分座，师辞曰：‘此非细事，愿生生居学地而自锻炼。’此语可愧后之上堂领众者多矣，即吾儒佩为箴砭，亦何虑德不进、业不修乎？”由于反对一味辟佛，他对明末以来之学自持一见。明末学者排佛，批评王畿、罗汝芳、李贽以禅诮儒，狂滥虚浮，攻击矛头乃至直指王阳明。高攀龙《王仪寰先生格物说小序》：“儒者之学，每入于禅者，以致知不在格物也”，“于是从心逾矩，生心害政，去至善远矣。”<sup>⑮</sup>清初学者承之，钱谦益、朱彝尊、黄宗羲、陆陇其辩说尤力。钱谦益《海幢先生墓志铭》：“然而姚江已下，理学少而禅学多。理学多伪，禅学多狂。伪者未必狂，而狂者或终归于伪，则识微者所深惧者。”<sup>⑯</sup>朱彝尊《书先文恪公覆杨通政劾罗近溪疏后》：“伯安诸弟子渐流于禅。至万历初，南城罗明德拾禅宗之余唾，惑世诬民，益无忌惮，狂澜不可遏矣。”<sup>⑰</sup>渔洋厌弃肤廓空谈，承认阳明后学有狂禅之弊，但不赞同将以禅诮儒等同空谈心性。《古夫于亭杂录》卷1引高珩《和寒山子诗》“真空乃妙有，此中生天地。空有即中和，岂得妄同异。鸱鼠笑鸿鹄，下士多苛议。学术本上乘，反訾无利济。试看王阳

明，勋业名当世。吹毛诋良知，又谓学乖刺。旨哉古人言，蚍蜉撼大树”，评云：“破却顽空。”当然，渔洋论学以儒为本，且不以阳明为宗，对黄宗羲属意专在阳明不无异议。《居易录》卷30：“至于黄梨洲《学案》，曾见原稿，属意处专在文成，亦属偏见。”

渔洋参禅一个重要目的，即澹泊心境，禅悦性灵。如《诰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念东高公神道碑铭》评高珩嗜佛：“公非图作佛，正藉此打破利名圈缚耳。”<sup>②</sup>道超屏绝宾伴，内外典常置膝前，渔洋《道超》：“我爱道超师，绝俗耽憩寂。”《林间录》载地藏琛禅师对禅客说：“诸方说禅浩浩地，争如我此间栽田博饭吃耶？”渔洋《地藏琛禅师》：“一笑视诸方，说禅方浩浩。”<sup>③</sup>由此可知，渔洋所谓禅可补儒，盖有二义：一是以禅证儒；二是超世脱俗。

（二）佛门斗诤。佛门宗派林立，顿渐之争久盛不衰，造成种种分野斗诤。明代济洞并衰，易代之际复振，聚讼亦炽。黄宗羲《答汪魏美问济洞两宗争端书》：“常谓昔之学佛者，自立门户者也；今之学佛者，倚傍门户者也。自立门户者，如子孙不藉先人之业，赤手可以起家；倚傍门户者，如奴仆占风望气，必较量主者之炎凉。”<sup>④</sup>陈垣先生撰《清初僧诤记》，考辨济洞之诤、天童派之诤、新旧势力之诤甚悉。清初居士亦不能免于争讼。渔洋以为佛门清净地不当斗诤不已，《居易录》卷26：“禅宗顿渐二门分途久矣，而顿门又自为矛盾，互相排诋，于佛祖无诤之义何居？尝读吴兴皎然禅师《能、秀二祖赞》云：‘二祖之心，如月如日。南北分宗，工言之失。’此语足为今日僧徒好斗诤之良药，特拈出之。”《法庆灵警禅师塔铭》又拈出灵警主法庆十五年“非徒以口舌争胜”赞誉之。诸如此论，大抵欲矫过激言行，平息佛门论争。

费隐与汉月、木陈俱天童门人，撰《五灯严统》排斥他宗，遭到洞宗觉浪等反对。渔洋熟悉这段公案，《答拙庵禅师》深表不许。康熙间，济宗超永编《五灯全书》，进呈御览，激怒洞宗中人。拙庵有《存诚录》初刻、二刻与诤，并作书渔洋，《与王侍郎阮亭书》：“今超永根《严统》之伪书，引近日之讹言，种种缪乱，某若隐忍而不敢言，此诚法门之罪人也”，“先生灵山嘱累，当代鸿儒，维持世道，不无公论。”<sup>⑤</sup>渔洋久未回书，后致书称赞他“卫道苦心”以示安慰，复举《严灯》之诤劝说放弃争讼，以免落人口实，《答拙庵禅师》其一：“大刻《存诚》二录，具知卫

道苦心。向所以不奉报者，以天界浪杖人与费隐一段公案流传诸方，至今以为口实，似不必又烦笔舌。且张无尽行事，污人齿颊，其言何足为有无哉！冤亲平等，岂况斗诤，唯吾师裁之。”<sup>⑥</sup>陈垣评云：“渔洋所养，超于拙庵矣。”<sup>⑦</sup>笔者认为，渔洋所养未必超于拙庵，答书甚缓盖因不赞同佛门斗诤。

木陈应召后炫耀恩遇，渔洋与见月谈及其事，见月蹙额说：“渠胸中面上，只有‘国师大和尚’五字。”见月持律甚严，故有不满。渔洋返扬州，楚云送别时对木陈也有讥评：“今高僧名衲，所至招摇炫鬻，以要观听。有司关防，甚如巨猾。”楚云乃觉浪再传，批评木陈不无济洞之诤缘故。渔洋初不以木陈行止为然，后持不必苛责之论：“佛印为坡公所喜，而行径如是，于恣公又何责焉。”<sup>⑧</sup>这一观点转变或受到木陈传人灵警、借山影响，不过更主要原因当是不赞同洞宗援此为斗诤口实。

一代文坛领袖钱谦益也是清初僧诤重要人物。他晚年逃禅，精研佛典，著《楞严蒙抄》10卷、《金刚心经蒙抄》10卷。由于遭历世变，受降清之辱，俯思明亡，遂力掊狂禅伪学。《武林重修报国院记》：“今之禅，非禅也，公案而已矣，棒喝而已矣”，“况乎聋瞽交唱，狂易相尊。”<sup>⑨</sup>《白法长老八十寿序》：“胥天下浸淫风靡，而吴越间为甚。”<sup>⑩</sup>为熄灭伪禅，剔除狂易，攻讦汉月不遗余力。渔洋以为其妄凭臆见，好为诋斥之非。《居易录》卷27：

予尝读三峰藏禅师《语录》及《五宗原》，以为末法中龙象。其提《智证传》，阐发临济、汾阳三玄、三要之旨，而欲远嗣法于寂音，亦天童之诤子也。而钱氏《列朝诗》谓“余分闰位，竟陵之诗与西国之教、三峰之禅，旁午发作，并为孽于斯世”云云。师与钱氏皆常熟人，而诋謏如此，岂别有谓耶？不可解也。

钱氏《列朝诗集小传》斥责竟陵锤、谭为诗妖。渔洋接受其说：“王、李白是大方家，锤、谭余分闰位，何足比拟？”<sup>⑪</sup>但不同意三峰之禅与竟陵之诗、西国之教“三妖不除，斯世必有陆沉之祸”一类说法。首先，以为汉月阐发临济之旨，于乃师天童多所补益。其次，钱氏所论既为洞宗攻击口实，又于济宗内部引起纷争，使斗诤更趋复杂繁琐。总之，为还佛门清修地，渔洋主张放弃纷然之争。陈垣《清初僧诤记》谓渔洋驳斥钱

氏“犹门外之言”<sup>④</sup>。从上，渔洋所论尚非“门外之言”。

（三）戒律修行。陈垣《清初僧诤记》以大汕为例考述济洞之争说：

石濂大汕，住广州长寿寺，自称觉浪盛嗣，不知其是否也。著书名《证伪录》、《不敢不言》、《源流就正》等，攻《全书》兼攻《严统》，攻《丘碑》兼攻叠出五代。潘耒乃作《天王碑考》反驳之，见《遂初堂别集》四，未非袒《全书》，实恶大汕耳。……渔洋《南海集》下，有《咏长寿寺英石赠石公》诗，而《分甘余话》四极诋之，殆受潘之影响。<sup>⑤</sup>

大汕九江人，确系觉浪法嗣<sup>⑥</sup>。所谓渔洋极诋之，指《分甘余话》卷4一段文字：

广州有妖僧大汕者，字石濂，自言江南人，或云池州，或云苏州，亦不知其果籍何郡。其出身甚微贱，或云曾为府县门役。性狡黠，善丹青，迭山石，构精舍，皆有巧思。剪发为头陀，自称觉浪大师衣钵弟子，游方岭南，居城西长寿庵，而日伺候诸当事贵人之门，尝画素女秘戏图状以媚，诸贵人益昵近之。于是无所忌惮，官粤东者落其圈绩，十人而九。余甲子奉使至粤，闻而心恶之。后闻其私贩往安南，致犀象珠玉、珊瑚珍宝之属，直且巨万，连舶以归，地方官亦无谁何之者。今河南布政使迁福建巡抚许中丞（嗣兴）为按察使，独恶之，辄逮治，诘其前后奸状，押发江南原籍，死于道路，粤人快之。余不识许中丞，即此一事，真颓波中砥柱也。

渔洋推重觉浪及其法嗣药地之学、竺庵之诗、石溪之画，长寿寺访大汕盖出于对觉浪嫡传之敬。迨闻大汕行止，颇不屑之，讳言晤面，而代以“闻而心恶之”。这一态度转变耐人寻味，仅称其受潘耒影响，或未尽然。

其一，渔洋重戒律，反对僧人纵欲放流，修行不密。《分甘余话》卷4录大汕事后复有一段文字，可为批评大汕注脚：国初一僧俗姓金，自京来诸城，与冠盖交往，有腴田数千亩，徒众数百人，鲜衣怒马，歌儿舞女，横行闾里几三十年。有金举人曾父事之，“余为祭酒日，举人方肄业太学，亦能文之士，而甘为妖髡假子，忘其本生，大可怪也。因书广州大汕事，而并记之”<sup>⑦</sup>。由此可知渔洋厌恶大汕，乃出于对戒律精严的肯定，并不关涉济洞之争。

其二，渔洋态度转变受屈大均影响更甚于潘耒。大均逃禅，师洞宗天然，名今种，字一灵。后返儒服，以佛老为异教，倡儒言儒行，主张僧徒言行也不离其教。大汕在岭南与士大夫冠盖相交，行止怪诞。大均作《花怪》诋之：“花无象，以人为象；花无心，以人为心。心之邪正，花不能隐，故观其花而其人之贤否可识焉。吾闻禅者工绘事，每为当路士大夫作春图，举闺房秘戏之曲折，一一得其精微。……紫夺朱，绛叛黄，吾将欲剪而去之，毋使世人为其所蛊，其亦所以扶持名教也耶！”<sup>⑧</sup>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暮春，渔洋抵广州，四月初与大均登阅江楼言别，十一日大均复来送行<sup>⑨</sup>。渔洋游长寿院赠诗大汕当在三月间，《广州游览小志·长寿庵》：“长寿庵，在西郭外，创于万历间，禅人大汕重新之。汕能诗画，营造有巧思。”<sup>⑩</sup>对大汕巧思不无欣赏。晤大均在后，所谓“闻而心恶之”，盖从大均闻大汕事甚悉。

大汕行止为渔洋及屈大均、潘耒诟病，但曾灿、方文等遗民对其节行亟为称赏。渔洋厉攻大汕，却为木陈辩诬，其中是否有木陈得帝王垂青之故？此可存疑。

渔洋参禅，每求顿悟自性，禅悦性灵。他好禅理而不喜佞佛，对佛事及佛典多有批评。如指出佛典妄诞处甚于《西游记》：“如善慧菩萨自兜率天宫下作佛，在摩耶夫人母胎中，晨朝为色界诸天说种种法，日中时为欲界诸天亦说诸法，晡时又为诸鬼神说法，于夜三时，亦复如是。虽稗官小说如《西游记》者，亦不至诞妄如是。”<sup>⑪</sup>批评《法华经》宣扬的布施“只令俗僧援为口实，为清净寂灭之累而已”<sup>⑫</sup>。这类指责时或不免可笑，从中也不难看出他参禅的旨趣。

#### 四、以禅喻诗

综上，渔洋参禅并非装点门庭，其事足增踵佛门。今人称其止得禅宗皮毛，不免偏颇。渔洋“神韵”说多借参禅开拓诗境：一是重活句以得禅髓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；二是禅意入诗，澹泊妙悟；三是禅语为诗，因禅成趣，亦可作文字观。

渔洋接绪严羽诗说，追求“妙悟”，认为冯班等人批评严羽近于酷吏罗织，《分甘余话》卷2：“严沧浪论诗特拈妙悟二字，及所云不涉理路，不落言诠，又镜中之象，水中之月，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云云，皆发前人未发之秘。而常熟

冯班诋謏之，不遗余力，如周兴、来俊臣之流文致士大夫，锻炼周内，无所不至。不谓风雅中，乃有此罗织经也。”严羽以禅喻诗，渔洋发扬这一传统，提出诗禅互参。《居易录》卷20：“象耳袁觉禅师尝云：‘东坡云：我持此石归，袖中有东海。山谷云：惠崇烟雨芦雁，坐我潇湘洞庭。欲唤扁舟归去，傍人云是丹青。此禅髓也。’予谓不惟坡、谷，唐人如王摩诘、孟浩然、刘昫、常建、王昌龄诸人之诗，皆可语禅。”《渔洋诗话》卷上：“云门禅师曰：‘汝等不记己语，反记吾语，异日稗贩我耶？’数语皆诗家三昧。”<sup>②</sup>据刘大勤《师友诗传续录》，他叹赏洞山所说“语中有语，名为死句。语中无语，名为活句”，引以证诗。编选《唐贤三昧集》尤重“活句”，名曰“三昧”，即取佛经自在之义。门人或问集前序传述严羽“羚羊挂角”云云，是否即“音流弦外之旨”，答云：“严仪卿所谓如镜中花，如水中月，如水中盐味，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，皆以禅喻诗。内典所云不即不离，不黏不脱，曹洞宗所云参活句是也。”<sup>③</sup>

渔洋以禅入诗，别开境界。后世论其取法，关注宗唐、宗宋诗法转换，自具道理。但还应看到渔洋视以禅入诗最近风雅，故于唐推尊王维，于宋推尊苏轼。明人谢肇淛称“诗境贵虚，故仙语胜释，释语胜儒”<sup>④</sup>。渔洋斥说：“殊多愤愤，启发人意处绝少”，“夫仙语如《步虚辞》等最易厌，释语入诗最近雅。今乃反之，岂非强作解事者？”<sup>⑤</sup>由于倡“释语入诗”，他喜好僧诗以至有嗜痂之嫌，如读宋人王铎《雪溪集》5卷，谓诗不能工，而独赏集中附载庐山僧可和诗一篇<sup>⑥</sup>。如果从以禅入诗角度来看，渔洋诗歌取法上的宗唐或宗宋，并无不可逾越的界限。

（责任编辑：又小易）

①王象晋入清课诸孙自娱，好禅悦。见《池北偶谈》卷5“方伯公答人诗”条，袁世硕主编《王士禛全集》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2007年，第2939页。王象春以为禅诗最上，侠、道、儒之诗次之。参见拙著《晚明诗歌研究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233、234页。王士禛长斋绣佛，见《池北偶谈》卷12“吴画余绣”条，同集卷21“体香”条，第3122、3344页。

②④⑤⑦⑨⑪⑬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袁世硕主编：《王士禛全集》，第4344、1584、1899、1794、2149、1840、4167、5029、1756、4606、4923、4492、3683页。

③王士禛：《蚕尾文集》卷2《御史梁皙次先生传》，袁世硕主编《王士禛全集》，第1813页。有关王士禛与梁熙等人交游事迹，参见蒋寅先生《王渔

洋事迹征略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41页。

⑤⑥王士禛：《蚕尾文集》卷3《答栖霞楚云和尚》，袁世硕主编《王士禛全集》，第1834页。道盛字觉浪，号浪杖人，住天界寺。顺治十六年示寂。钱澄之《住寿昌观涛奇禅师塔铭》称明代洞宗衰微，至道盛“云兴泉涌，归依者几半天下”。见《田间文集》卷23，合肥：黄山书社，1998年，第455页。

⑦蒋仁锡：《雍益集书后》，《雍益集》，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，第227册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97年，第418页。

⑧归庄：《归庄集》卷3《送筇在禅师之余姚序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240页。

⑨《北游集》卷6，参见陈垣《清初僧诤记》，《明季滇黔佛考》附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537页。

⑩⑪⑬⑮⑯⑰⑱⑲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王士禛：《渔洋精华录集释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52、1172、1290、1295、1896~1898页。

⑪王士禛：《阮亭诗选》卷14《题四宜堂留上剖石和尚》，清康熙刻本，第16页。

⑫王士禛：《阮亭诗选》卷16《辛丑诗三》，清康熙刻本，第4页。

⑬王士禛：《阮亭诗选》卷17《辛丑诗四》。集前自序：“秋七月，居銓江。”

⑭王士禛：《渔洋精华录集释》卷3，第510页。栖霞僧即楚云，惠栋、金荣诗注未言及。

⑮⑯⑰⑱⑲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郭绍虞编：《清诗话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78、153、180、149~150页。

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高攀龙：《高子遗书》卷9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集部，第1292册，第548页。

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钱谦益：《钱牧斋全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8册573、第2册1110、第5册966页。

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朱彝尊：《曝书亭集》卷53，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第358册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26年，第421页。

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黄宗羲：《黄宗羲诗文集》，《黄宗羲全集》第10册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178页。

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陈垣：《清初僧诤记》卷1《济洞之诤》，第505~509页。《严灯》之诤、《天王碑》之诤，俱参见《清初僧诤记》卷1《济洞之诤》。

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陈垣：《清初诗僧记》，第509、534、510~511页。

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曾灿：《石濂上人诗序》：“予从杖人久，因获交其天木、石潮、蒲庵、观涛数君子，而往往不得与石濂师遇。”见《六松堂文集》卷12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，第152册，台北：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9年，第304页。

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潘耒：《救狂砭语》，《金陵览古》（外二种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201~204页。

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屈大均：《道援堂诗集》卷6《喜王阮亭官詹至粤，即送其行》，清康熙刻本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，第52册，第605页。参见蒋寅先生《王渔洋事迹征略》，第311页。

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谢肇淛：《小草斋诗话》卷1，《全明诗话》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2005年，第3504页。